

◎ 许金榜 主编

山东分体文学史· 戏曲卷

齐鲁书社

山东分体文学史

—— 戏曲卷 ——

主 编 许金榜

副主编 石 玲

韩霜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 戏曲卷/许金榜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1

ISBN 7-5333-1436-0

I. 山… II. 许… III. ①文学史—山东省 ②地方戏—文学史—山东省 IV. I209.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404 号

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

戏曲卷

许金榜 主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436-0/I·305

定 价 21.00 元(全套 4 册定价:152.00 元)

前言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传统。

根据考古发掘的山东沂源猿人的化石，沂源猿人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与北京猿人相当，是山东最早的远古人类。此外，在沂水、日照、新泰、郯城、蓬莱等地也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由此可见，早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已经遍及山东大地。在距今 7000~4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资料，滕州的北辛文化、泰安的大汶口文化、章丘的龙山文化、平度的岳石文化，不仅有磨制的石器、骨器，而且有精致的陶器，还有冶制的铜器，并发明了纺织、酿酒等技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同一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即包括众多部落的东夷族。史前时期的东夷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原文化，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当然，它与中原文化也有相互交流和影响。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有三大部族集团，即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集团、今山东一带的东夷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它们的文化既有不同，又相互影响。大约在华夏集团的炎（神农氏）黄（轩辕氏）时代，东夷族出现了两个著名的部落首领，即太皞（一说即伏羲氏，蛇首人身，与女娲兄妹而婚）和蚩尤。太皞部落在今菏泽、济宁一带，同中原的炎黄部落有斗

争，也有融合。蚩尤冢在寿张，传说他曾驱逐炎帝，炎帝向黄帝求救，黄帝大战蚩尤，并杀之。此后，黄帝的后裔少皞又以曲阜为中心，强盛一时。今曲阜城东有少昊陵，城北有传说黄帝的出生地寿丘。尧时，东夷族又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首领舜，并成为尧的继承人。由此可见，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是相互穿插和影响的。夏商时代，华夏集团的夏族原居于河南西部一带，后东迁，与东夷结为部落联盟，首领轮流担任。禹治水有功，舜乃让位于禹。太康失国后，夏政权又一度落入东夷族的后羿和寒浞之手。原隶属于夏的商，始祖契都于蕃（今滕州），汤都于亳（今曹县）。据《竹书纪年》载，商王南庚曾迁都于今曲阜，都在山东境内。因此夏商文化和东夷文化也是相互影响的。活动于陕甘一带的周人本为夏的一支，商灭夏后成为商的诸侯，后周武王灭商，其各封地称诸夏，形成一个华夏民族，东夷也逐渐融入其中。周武王封其岳父姜尚于齐，封其弟周公旦于鲁。姜尚治齐，“固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①后又经管仲的努力，使齐国强大起来，成为霸主。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学者云集之地，百家争鸣之所，是全国学术文化最繁荣的地方。周公旦之子伯禽治鲁，则“变其俗，革其礼”^②，使鲁国成为礼乐之邦。孔子的出现，使鲁地成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作为华夏文化重要部分的光辉灿烂的齐鲁文化，齐鲁也成为山东的代称。而山东作为行政区划，则是后来之事。战国秦汉时通称崂山或华山以东为山

① 《汉书·地理志》。

② 《史记·鲁周公世家》。

东；春秋时晋国、北魏和五代时晋国则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金代设山东路，后又置山东东路（治所益都）、山东西路（治所东平），山东才成为行政区划名，其疆域与今山东大致相同。本书中的“山东”基本是指今山东所属的地区。

中国古代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艺术，它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绘画、杂技等多种艺术因素，也吸收融合了诗、词、曲、赋、散文、说唱、小说等各种文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孕育阶段。山东戏曲也是如此。

音乐歌舞在远古时代即已产生。当时的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和庆祝活动。山东地区也不例外。关于乐舞乐器，据说庖牺氏作瑟和陶埙，而庖牺氏与太皞为一，可见瑟、埙均在上古时期已产生于山东一带。此说虽尚无定论，但今潍坊市姚官屯龙山文化层出土的陶埙却是确定无疑地证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已有埙的吹奏。其后见诸记载的乐舞，舜时命夔作乐舞《箫韶》，夏代乐舞有《大夏》，商代有《大濩》，周代的《大武》则已具有明显的故事性和具体舞法的记载。这些乐舞都与山东有关。根据史料记载，孔子时的鲁国，雩、雩和蜡祭盛行，其中都有歌舞。而这些祭祀歌舞都有巫覡扮做神的形貌，已具有戏曲的扮演因素。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民间歌舞则更为发达。秦汉时期，角觥戏兴起，其中的蚩尤戏即起源于山东。山东境内至今还存有汉代角觥百戏画像石和陶俑。南北朝时，接近戏曲形式的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即包括今山东之境。在科白滑稽表演方面，春秋时齐国有俳优优施，战国时齐国有类似俳优的淳于髡，东晋时后赵的科白剧弄参军也产生于山东边界。此外扮演人物故事的傀儡也始于包括山东在内的北齐。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汇合，山东出

现了许多音乐歌舞人才，在此基础上，标志着中国戏曲形成的《踏摇娘》和参军戏终于出现在山东大地上。到宋金时期，参军戏又发展成为宋杂剧和金院本。到元代，金院本则演变为元杂剧。而山东则是元杂剧的创作中心之一。由此，中国和山东的戏曲走向了成熟和辉煌。

山东的元杂剧剧目约有 80 种左右，今存剧本 11 种。山东是元杂剧创作的重要地区，其中东平是早期元杂剧四大创作中心之一。元代的东平出现了一大批杂剧作家，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如高文秀就是写黑旋风剧的名家，其《双献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李逵形象；而其《浣池会》则是历史剧中的佳作。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张寿卿的《红梨花》也是颇有影响的作品。济南也是元杂剧创作的重要地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对梁山义军的热情歌颂，对义军和人民亲密关系的描写，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作品对李逵形象的塑造和喜剧艺术技巧，都堪称一流。武汉臣的《生金阁》、《老生儿》和岳伯川的《铁拐李》也都是上乘之作。

有明一代，北曲杂剧衰落，山东的杂剧作家作品也为数很少。其中贾仲明虽杂剧数量较多，但多为才子佳人和神仙道化剧，质量难称上乘。倒是他增补的《录鬼簿》，为 82 位作家补写了〔凌波仙〕吊曲，对作家的排列次序、姓名年号、生平事迹也有所更动，为元杂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另有《录鬼簿续编》也极可能为贾仲明所作。该书著录了元末明初曲家 71 人，杂剧作品 78 种。还有无名氏杂剧 78 种。这是研究元末明初杂剧的惟一重要史料，十分珍贵。冯惟敏《僧尼共犯》写僧尼爱情，批判禁欲主义，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个性解放思潮；其《不伏老》写 82 岁的穷秀才梁颢追求功名富贵的

情景，生动地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可悲而又可笑的心态。

明代传奇兴盛。但因传奇为南曲，故作家多为南方人。山东人不熟悉南音，故明代的山东传奇作家很少，有作品传世的仅有李开先一人。不过，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却是明传奇中的优秀作品。该剧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抒写了对现实的不满。剧中的林冲虽颇多忠君色彩，但他的清醒自觉的为国为民思想和对黑暗势力的主动出击、坚毅勇敢的斗争精神却是《水浒传》中的林冲所不能及的。它表现了文人意识和时代精神的融会，比明初传奇的爱情家庭题材和宣传礼教的倾向，这是一种新的开拓。它的语言清疏流畅，在骈俪之风盛行的当时，也是十分可贵的。

有清一代，也许是受孔尚任戏曲创作成就的影响，曲阜、济宁一带出现了一批杂剧作家。其中孔广林《女专诸》歌颂刺杀奸臣郑国泰的女英雄左仪贞，孔昭虔《荡妇秋思》写青年士兵杀敌保国的壮志和壮志难酬的悲凉及其妻思念丈夫的痛苦，许鸿磐《西辽记》、《雁帛书》、《儒吏完城》等表现反奸爱国思想，孔昭虔《葬花》、许鸿磐《三钗梦》由《红楼梦》改编为杂剧，均有思想艺术价值。桂馥《后四声猿》以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不得意之事抒写作者的苦情和烦恼，剧本短小精悍，人物个性鲜明，文笔明快清新。济南作家叶承宗《孔方兄》揭露世人对金钱的崇拜，《贾阉仙》借贾岛抒写文人怀才不遇的悲愤，蒲松龄《闾窘》、《考词》写科举制度下文人的复杂心态，莱阳作家宋琬《祭皋陶》描写忠良遇难的遭遇和对清明公正的期盼，都是较好的作品。

清代的山东传奇作家，虽数量不多，但出现了戏曲史上的巨星孔尚任。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

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的兴亡，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歌颂了爱国将士和下层人民，抒写了兴亡之感。作品突破了才子佳人的旧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型的女性李香君的光辉形象。剧本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结合起来，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件，又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作品以离合之情，写一代兴亡故事，爱情与政治的结合达到了古典戏曲的最高水平。结构精巧严谨，无懈可击。它和《长生殿》构成了清代传奇的两颗巨星，标志着传奇剧发展的顶峰。曲阜孔氏传奇作家尚有孔传铤、孔广林。孔传铤《软羊脂》、《软邮筒》、《软银铍》均以男女爱情婚姻为线索，插以小人拨弄乃至政治军事斗争等复杂情事，情节冗杂曲折。孔广林《斗鸡忤》写唐明皇时内廷鸡坊队长贾昌，在安史之乱后拒不再开鸡坊，自我忏悔，终得升天，从而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误国。诸城丁耀亢是清代另一位比较重要的山东传奇作家。他的《化人游》借书生何野航怀才不遇，狂游江海，抒写作者于明清易代之时的失落和迷茫。《赤松游》借张良的为韩复仇，反映了作者对明王朝的忠心和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仇恨。《西湖扇》写才子佳人在金代的悲欢离合，反映了作者对清朝统治的接受。《蚺蛇胆》（《表忠记》）通过歌颂明代杨继盛的忠，表现了作者对清廷的忠心，但也抒发了对时事的感慨。总之，丁耀亢的剧作反映了清初知识分子的心迹。此外，汶水路术淳《玉马佩》、莱州龙泉山人《梦中因》皆写书生得到佳人、功名的故事，表现了文人的愿望和幻想。

清代中叶，传奇衰落，地方戏蓬勃兴起。山东的地方戏剧种繁多，大体上可分四个系统。一是弦索系统，包括柳子、大弦子、乱弹、罗罗戏等。二是梆子系统，包括山东梆子、枣

梆、莱芜梆子、东路梆子等。三是肘鼓子系统，包括茂腔、柳腔、柳琴戏、五音戏等。四是其他剧种，包括两夹弦、四根弦、吕剧等。这些剧种的音乐体制除弦索系统仍为曲牌体以外，其他均为板腔体。板腔体是中国古代戏曲音乐的一次革命，而音乐体制的变化又造成了剧本结构、戏曲语言的变化，从而使地方戏能更加自由灵活地反映生活，题材内容更加贴近群众（写英雄好汉、家庭伦理和民间日常生活故事尤多），富有生活气息。思想情趣更具民间色彩，语言更加通俗平易，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许多剧目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但由于地方戏剧本的作者多为伶工布衣，文人雅士鲜有染指，故剧本极少刊印，今存者更为罕见。

综观山东古代戏曲，在题材上以描写农民起义、英雄好汉和家庭伦理及民间日常生活故事较多，而写才子佳人的故事较少。如元杂剧中的水浒剧共有20余种，其中山东作家的作品就占了10余种，而且质量最高。明代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也是水浒剧中的杰作。山东地方戏中更有一批描写瓦岗寨起义和杨家将以及其他英雄好汉的作品，如梆子戏《打登州》、《盗骨》、《敬德打朝》、《张飞冯辕门》、《华容道》、《单刀会》，山东梆子《两狼山》、《穆桂英征东》、《秦英征西》、《姚刚征南》、《雷振海征东》等。这些作品多具有民间传说色彩，反映了山东人民勇武豪爽、忠义爱国的优秀品格。山东地方戏中写家庭伦理和民间日常生活的戏尤多，如枣梆《求妻》、《晒鞋》，柳琴戏《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姊妹易嫁》、《小借年》、《小姑贤》、《王定保借当》、《喝面叶》、《拾棉花》，柳腔《赵美蓉观灯》，五音戏《王小二赶脚》、《王二姐思夫》、《拐磨子》，

两夹弦《换亲》、《翻箱子》等。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幽默风趣，生动活泼，反映了山东人民淳朴乐观的性格。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才子佳人爱情剧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元杂剧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在明清传奇中更有“传奇十部九相思”之称。但在山东古代戏曲中，这类作品却相对很少。这是山东古代戏曲在题材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

在思想内容方面，山东古代戏曲也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的作品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如高文秀《双献功》、武汉臣《生金阁》对权豪势要的揭露，岳伯川《铁拐李》对官府黑暗的反映，李开先《宝剑记》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迫害忠良的描写，孔尚任《桃花扇》对南明小朝廷上自皇帝、下至文臣武将为私利而误国的批判，都是极为深刻的。有的作品歌颂了人民对邪恶势力的反抗斗争精神，如康进之《李逵负荆》中李逵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武汉臣《生金阁》中的郭成提头追赶庞衙内，李开先《宝剑记》中的林冲杀贼投奔梁山，还有地方戏中的瓦岗英雄，都以其英勇的反抗精神给人以鼓舞。有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高文秀《浣池会》中的蔺相如为国家不顾生死、不计私仇，《桃花扇》中的史可法为国壮烈捐躯，地方戏中的杨家将忠心报国，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的作品抒写了文人怀才不遇的不平和悲愤，如高文秀《薛范叔》中范雎才高而遭受迫害，桂馥《后四声猿》中的李贺、苏轼和叶承宗《贾阉仙》中的贾岛，也都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悲苦。有的作品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美好爱情的理想，如李好古《张生煮海》通过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冯惟敏《僧尼共犯》则通过僧尼的爱情提出了“惟愿取普天下庵里寺里，都似俺成双作对”的愿望。至于地

方戏中的爱情，则更加大胆，如吕剧《大闺女要婆家》，对爱情的追求公开坦率，柳腔《赵美蓉观灯》中的赵美蓉甚至因其父亲嫌贫爱富而女扮男装，以观灯为名，投奔婆家。山东地方戏中还有些作品作过家庭关系的描写，表现了进步的伦理道德观念，如五音戏《二子争父》（后改编为《墙头记》）批判不孝子，提倡孝道，柳琴戏和吕剧《小姑贤》则批判婆母对儿媳的虐待，歌颂小姑对嫂嫂的关爱。也有些描写民间日常生活的小戏则表现了人民淳朴乐观的思想性格，如五音戏《王小二赶脚》、《拐磨子》等。当然，山东古代戏曲中也有的作品含有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宣传和反对农民起义等内容，但那不是主流。从总体上看，山东古代戏曲的思想内容是积极健康的。

在艺术方面，山东古代戏曲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康进之《李逵负荆》中的李逵，既有热爱梁山事业、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本质性格，又有粗豪鲁莽、勇于认错、天真稚气、稍带狡黠的可爱而又可笑的品格，个性鲜明，血肉丰满。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新型女性形象。她不同于传统的佳人美女，而是一个有着鲜明的政治态度、敢于反抗权奸、能够为了国家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女性。这一形象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其他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难以一一列举。山东古代戏曲在艺术手法上颇多创造性。如《李逵负荆》的喜剧手法，运用误会制造喜剧冲突在我国戏曲史上就是首创；从人物性格出发挖掘喜剧性也是早期戏曲最成功的范例。地方戏中喜剧更多，手法更加丰富多彩。又如孔尚任《桃花扇》，创造性地总结发展了前人的艺术经验，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爱情与政治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戏曲的最高水平。在语言方面，山东

古代戏曲的语言以本色通俗为主。山东的元杂剧作品基本上都是本色之作。山东的明清传奇也基本上没有骈俪之作。李开先《宝剑记》虽受骈俪之风的影响，但语言却比较清疏流畅，在骈俪之风盛行的当时，应该说倒透出了一股清新之气。至于山东地方戏的语言，则不但质朴通俗，而且乡土气息十分浓厚。

研究山东戏曲的历史，填补山东戏曲史的空白，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通过总结山东古代戏曲的成就和经验，并以此作为借鉴，对于提高和推动今天的山东戏曲的创作，促进山东戏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许金榜

2004年6月

总 序

地域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而地域文学研究则是近年才提起的一个话题。如何看待文学的地域性，以及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都是这类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文化的地域性，不少学者有所论及，而文学的地域性则尚在探讨之中。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其民族文化直接、生动而形象的反映。文化的地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但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先秦时期，秦、汉统一之后，统一的中华文化逐渐形成，地域文化的界限也逐渐消泯，其独立形态已不复存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的影响，如何认识这类影响与文学的关系，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山东作为行政区域，是金、元以后的事情。明、清以来，山东辖区也经常变动。为叙写方便，本书所指“山东”，为今之山东省所辖的范围，大致为先秦齐鲁故地。谈论山东文学，就不能不涉及山东的地方文化，特别是与存在于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的关系。

齐鲁文化是存在于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其渊源、形成及

其特征,有不少专门论述,不是本书研究的范围。就一般情形而言,齐鲁文化的形成,社会历史因素自然是主要的,如齐、鲁建国初期所实行的政策及其治国方针等,而从地域角度考察,其形成也与它们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产生对自然的依赖。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平原地区的人们,从事农桑;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则逐水草而居。人类各族群具体的生活环境及其生存方式,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气质。譬如先秦的齐、鲁今天同属山东省,而在古代却属两个文化类型区。齐地东濒大海,西有黄河、济水流贯境内,南界泰山,北临渤海。在地缘上海陆两便,农牧而外,兼擅渔盐之利。而鲁地处泰山之南,地势比较平坦,丘陵和平原都适于农牧。生活在海滨的人们,重视商业利益,注重智谋才干,思想较为开放、活跃;而生活在山区和平原的人们,则以耕牧为主,重农重桑,安土重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谐和相处,思想则相对较为保守。因此,齐国出现了齐桓公、管仲这样极富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以及开放型的稷下学术,而鲁国则出现了孔子、孟子这样古代文化的传承者,以及适应农耕社会、延续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当然,形成某些文化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而地域文化的因素则是不容忽视的。秦汉以前,分散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诗经》、《楚辞》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而在秦汉之后,地域文化逐渐融入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其独立形态已不复存在。但作为文化积淀,特别是沉积在人们心理、精神和风俗习惯之中的某些因素,仍然对当地人们

产生影响。因此，今天以今政区为范围的山东文学研究，仍然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研究一个区域的文学，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与全国文学发展的关系。

齐鲁自古为文学之邦，是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发源地。先秦时代，齐鲁特别是邹鲁一带，人文荟萃，是我国散文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散文奠基时期的作品，作者大都为齐鲁人。就史传散文而言，第一部编年史《春秋》，相传为孔子编定；为传述《春秋》而作的《春秋左氏传》，相传作者左丘明为鲁国人；第一部国别史《国语》的作者，据司马迁等的说法，也是左丘明；第一部史传文学作品《晏子春秋》，作者是齐国人。诸子散文，如《论语》、《墨子》、《孟子》等，书中记载孔子、墨子和孟子的言论行事，编著者也为齐鲁人。据近人考证，庄子为山东东明人（冯友兰认为是山东曹县人，见其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他，如编辑管仲言论的《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晏子》、《田俅子》、《鲁仲连子》、《牟子》、《田子》、《黔娄子》、《邹奭子》、《邹子》等，编著者都是齐人。这些散文作品，不只对齐鲁地区，也对我国传统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形成，以及散文体制、语言风格，都曾产生重要影响。譬如《论语》、《孟子》两书中记载的孔子和孟子有关文学的言论，以及孔孟学说，经过后学的补充、阐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对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曾经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有关文学艺术的言论，则是形成我

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基础。再如史传散文的重史意识。儒家重视文化传承，因而重视历史。面对社会变动，儒家重史的着眼点一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警诫当世，一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依据。这种重视现实、讲求实际的态度，就要求记述史实的文字质朴、简洁。着眼于社会政治，对叙述文字的要求，对齐鲁乃至全国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齐鲁也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发源地。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虞书》，是虞舜任命夔为乐官时所说的话。而“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①，诸冯据考为今山东诸城市；东夷是今山东地区上古时期的土著居民，而舜则是东夷文化的代表。中国诗歌理论发轫于《尚书·虞书》，而奠基于孔子。《论语》中有关诗歌本质特征及社会功用的论述，奠定了我国古代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自汉至南北朝，籍出山东的郑玄、刘桢、颜延之、檀道鸾、王筠、任昉、徐陵、颜之推有关文学批评的言论，特别是刘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使我国文学理论获得重大发展。唐宋时期，籍属山东的崔融、王禹偁、穆修、石介；明清时期，李开先、李攀龙、谢榛、王士禛、赵执信等，他们有关诗文创作的论述，都曾对当时文坛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建安风骨”、“左思风力”，对我国诗风的影响极其深远；王融与沈约倡导的“永明体”诗，以及何逊、徐陵等人的创作实践，对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则具重要意义。唐宋古文运动，孙逖、吕才揭橥于前，王禹偁、穆修、石介等发扬于后，对于推动散文革新也曾起到一定作用。宋、元之际，东

①《孟子·离娄下》。